

三线建设研究述评

李彩华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 文章简要介绍了三线建设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出版研究资料方面的进展, 评判了目前三线建设研究中若干具有学术意义的思想, 提出了今后三线建设研究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 三线建设; 调整改造; 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K27; F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1) 10-0098-05

从1964年秋天开始, 在中国腹地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 历时17年, 初步建成了战略后方基地, 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件影响深远而特殊的历史事件。由于种种原因, 三线建设状况鲜为人知, 其发展变化又举世瞩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三线建设研究浮出水面。国内外一些研究者开始了对三线建设的关注, 当事人或亲历者也从不同角度回忆三线建设, 发表或出版了一定数量的文章和研究专著, 但对于这一事件一些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不少重大分歧, 值得关注。

一、三线建设研究成果概况

对三线建设的公开研究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三线建设的质疑和调整。在清理和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经济建设的诸问题中, 对三线建设决策是否正确、实践是否失败的争论十分激烈。鉴于三线建设确实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在全国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 从1979年到198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对三线建设的一些企业进行了初步调整。1983年以后, 国家有计划地对三线部分企事业单位进行调整改造, 2003年宣布调整改造完成。这期间, 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简称三线办)多次召集三线调整研讨会, 协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大量关于调整的政策文件, ①既担当着领导、统筹协调三线调整的重任, 又推动了三线建设和调整的研究工作的展开。

1995年《党的文献》第3期选刊了一组《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编》珍贵资料, 1996年第3期又选刊了一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文献选编》; 甘肃省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编辑了文献资料性质的《甘肃三线建设》(1993年); 三线建设所在各省区地方志、专志的相继出版; 《当代中国丛书》(邓力群等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83—2001年)各部门、各地方卷的陆续出版, 这都是目前三线研究主要的公开文献资料。

国内三线建设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陈东林的《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年)以西部大开发为视角对三线建设历史进行了翔实的考察和评价; 何郝炬等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年)在概述大三线建设基础上, 分别阐述了四川、陕西、贵州等省三线建设及其与西部开发的联系; 林凌、李树桂撰著的《中国三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DJ002)。

作者简介: 李彩华,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

①《充分发挥三线企业作用的理论与实践》(1987)、《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有关政策文件选编》(1992)是三线办总结编印的三线调整重要文献资料。

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较早地专门研究了三线生产布局问题。据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及“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直接或间接研究三线建设的文章逾百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三线建设为选题的,已至少有9篇。

可见的海外研究成果,如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贝雷·纳顿的《三线:中国内陆地区的国防工业化》(《中国季刊》第115卷,1988年9月),作者认为中国三线建设的负面影响超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日本研究三线建设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东京大学的丸川知雄和神奈川大学的吴晓林。吴晓林的《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战略:中国三线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御茶水书房,2002年),反驳了“三线为国防”的观点,强调“三线为经济”,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政权时期就已经有三线建设的基础。丸川知雄的《中国的三线建设》(日本《亚洲经济》1993年第34卷第2、3号)、《再论三线建设》(日本《亚洲经济》2002年第43卷第12号)等文章,更多从经济学视角评价三线建设成效,并反驳吴的一些观点。

其他领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史研究”、“当代中国基本建设研究”、“区域经济研究”、“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研究”、“国防工业研究”、“军转民研究”等都不同程度涉及了三线建设和调整改造的内容。有些传记和历史事件的回顾也涉及三线建设,如《毛泽东传(1949—1976)》、《李富春传》、《彭德怀在三线》、《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程子华回忆录》、《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钱敏谈西南三线建设》等。由原三线办主任王春才主编的大型系列报告文学《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回忆文集《三线建设铸丰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展现了三线建设的辉煌成就和三线人精神。另外,凤凰卫视编播了10集系列片《三线往事》,以珍贵的资料回忆和再现了三线建设的历史。

二、关于建设三线战略决策的研究

官方对建设三线决策持肯定态度。1991年4月,江泽民在西南三线建设重点项目视察时曾指出,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建设三线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一次三线建设工作会议上也说,三线建设总的部署、布局和原则是正确的,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①

学术界对建设三线的决策持不同态度。多数论者肯定了建设三线决策的必要性,分析了决策的缘由:首先是为了战备,1960年代中期周边国际关系紧张,中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军事压力、战争挑衅和侵略威胁。其次是出于改善中国工业不合理的布局,促进经济长远发展的考虑。最后是借鉴了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经验和教训。战争初期由于苏联在欧洲地区没有防空设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的破坏。战争爆发后,苏联加大远东发展力度,采取了迅速把工业重心特别是国防工业的重心从欧洲部分的莫斯科等大城市转移到乌拉尔山脉及亚洲的西伯利亚腹地的战略决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后方保障。

有研究者辩证地看待三线建设决策。邬翊光认为,三线建设决策在战略上是正确的,失误主要是战术性的。^②赵士刚则认为,从经济建设方面评价,三线建设是得不偿失的。但三线建设不是一件单纯经济事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1960年代中期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并不是凭空臆造的,搞三线建设是为有备无患。^③有的研究者并不完全认可建设三线这一决策。高伯文认为,客观存在的战争威胁

①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408页。

② 邬翊光:《我国生产力宏观布局“西进”和“东回”战略转移的评价》,《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992年第2期。

③ 《共和国经济风云》下,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和党内主观指导思想“左”的失误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使本来必要的战备和战略后方基地建设,过分强调了区域布局的国防安全原则。^①周民良认为,三线建设对于改变当地经济面貌有一定作用,但如果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地区,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的局面。^②

笔者认为,是否建设三线战略后方与三线建设得失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不能因为战争没有打起来或建设中存在问题而否认建设战略后方的必要。战略后方是国家战时前线作战后勤供应的主要基地,是坚持战争、争取胜利的主要依托,也是平时时期保障经济建设、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那种以为建设三线的决策是过高估计发生战争可能的产物,认为事实上仗并未打起来而证明建设三线决策是错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不严肃的。战争的爆发和制止战争从来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所准备也是制止战争的因素之一。^③

三、关于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

马英民高度肯定了三线建设的巨大功绩是永远不可抹杀的,它对于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促进内地省区的科技繁荣和文化进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三线建设者们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传承。^④多数研究者都从加强国防建设、改善工业布局等方面肯定三线建设的历史成就,同时也指出和分析了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茂桐指出,三线建设尽管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三线建设仍然是中国基本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客观上初步改变了中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⑤陈东林认为,三线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中国腹地建成了巩固的西部后方,成为巩固国防、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保障;它建立的当代中国强大的西部国防工业基地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和统一军事行动中,将发挥极其重要的军事作用;它使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差距再度得到缩小,初步改变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在西部建成了一大批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一大批科技力量,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还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初步繁荣。^⑥研究者也普遍承认,三线建设确实存在问题,主要是:规模过大,战线拉得太长;违背客观规律,违反基建程序;中观微观观点过于分散,布局不尽合理;经济结构不合理,忽视生活福利;管理上自我封闭,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低等。高伯文认为,评价三线建设,不仅要考虑其政治意义,而且还要考虑经济意义。三线建设既要按照军事建设规律和国防安全原则,又要遵守经济建设规律和区域布局原则。他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既肯定了三线建设的区域经济意义,也分析了其区域经济的负面影响。^⑦

与上述观点不同,有研究者对三线建设的成就和历史作用基本持否定态度。三线建设经济效益差成为学者直接否定三线建设历史地位的主要依据。最早《人民日报》有文章批评“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工作“左”倾错误时,以三线建设为例,认为其片面强调内地建设,忽视沿海建设,在山、散、洞错误方针指导下,投资过多,使用不当,效果很差。^⑧周民良认为,巨大投资的三线建设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也进一步加剧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⑨徐焰则指出:三线建设不

① 高伯文:《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

② 周民良:《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思考》,《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年第19期。

③ 李彩华、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

④ 马英民:《当代中国建设史上的创举——三线建设》,《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⑤ 茂桐:《三线建设:中国基本建设史上的空前奇迹》,《党史文汇》1999年第6期。

⑥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403-418页。

⑦ 高伯文:《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25、233、243页。

⑧ 《提高运输业的投资效果》,《人民日报》1980年8月1日;《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论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人民日报》1981年4月9日。

⑨ 周民良:《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思考》,《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年第19期。

仅直接损失高达数百亿元,留下严重后遗症,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入封闭偏远的三线,政治上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使中国丧失了利用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前期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良好机遇。^①

李曙新则客观分析了影响三线建设经济效益的体制因素、地区因素和周期因素。他认为,三线建设正值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几近僵化时期,是在基础薄弱的落后地区大规模进行,成本必然高于在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发,三线建设投资的滞后效应难以在建设期内体现出来。^② 陈东林强调,三线建设几个阶段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区别的,“一概从决策上否定和肯定,都是不实事求是的”^③。

四、关于三线调整改造的研究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前,对三线调整改造的研究主要是按照国务院1983年作出的“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针对三线7%问题较大的企业单位进行的,鲜见研究者把调整改造纳入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视野来探讨。研究者主要围绕怎样通过调整使三线企业脱险搬迁、发挥潜能,就三线调整的重要性和方针、主要内容、特点、成就及缺憾问题展开讨论。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研究者不仅把三线建设作为建国后一次西部开发,还把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研究,视三线建设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通过对比,为西部开发提供借鉴。

陈东林认为,党中央从1986年开始,主要从布局、产品方向、产业结构和技术改造几个方面,对三线企业进行了调整改造,改善了企业的外部环境,稳定了职工和科研队伍,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体制转变,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准备。^④ 笔者则比较详尽探讨了三线调整任务的提出、调整方针的制订、调整内容的展开、呈现的特点以及调整的成效和意义。认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对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是非常必要的,在中观和微观的布局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以及一线、三线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次调整改造具有布局调整为主与其他方式兼顾、政府扶持与企业自谋出路相结合等特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过去三线建设遗留问题的矫正,是三线地区经济、国防建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完善。^⑤ 笔者还分析了20年来的调整既取得了成就,也留下了缺憾。认为“六五”、“七五”、“八五”时期,由于国家加大对沿海地区的投入,对中西部投入大幅减少,用于三线调整的资金更为有限。调整一开始,就制约了对三线企业调整方向的选择,调整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少数不成功企业的搬迁上,而对绝大多数成功和基本成功,但急需配套完善的企业无力顾及,对已经形成格局但配置并未完成、综合生产能力也未最终完成的三线建设,是非常不利的。^⑥

何郝炬、何仁仲等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用相当篇幅探讨了四川、陕西、贵州、云南等省三线建设为西部开发提供的历史借鉴以及在大开发中的战略构想。晁丽华则运用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国防科工办所藏的一手档案、文献资料,对云南20年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历程、成就和特点作了详细的论述。她认为,云南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建设中遗留的问题,发挥了三线企业的应有作用。三线建设以其独有的资源、技术等优势,为云南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经验和借鉴。^⑦

① 徐焰:《“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五十年来我国对时代特点的认识》,《百年潮》1999年第3期。

② 李曙新:《三线建设的均衡与效益问题辨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③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441-442页。

④ 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⑤ 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⑥ 李彩华、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

⑦ 晁丽华:《云南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历史研究》,《红河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除了上述问题,近些年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物与三线建设研究已有初步成果。还有研究者进行了普通人物与三线的研究,如《三线人身份的认同与构建的个案研究》、《对351名三线建设者矽肺患病情况的调查》、《三线建设内迁大移民》等。13个省区的三线建设研究以及少数小三线地区的建设、三线精神、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问题等等,也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第一，积极挖掘、整理和公开三线建设文献资料档案。目前关于三线建设的大量档案资料尚未向社会公布，直接妨碍了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因此，搜集、挖掘、整理乃至抢救三线建设资料已成为国史、党史研究刻不容缓地重要任务。首先，中央地方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历史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公布和出版，以新材料支撑研究的深入。其次，积极抢救和整理“活史料”。亲历三线建设的许多人还健在，可以通过不同角色的历史当事人回忆各自经历的三线建设，《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钱敏谈西南三线建设》和网络上出现的回忆文章就属这类。研究人员应有甘当人梯的责任感，为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做抢救和整理工作。再次，挖掘实物史料并有效利用。重庆废弃兵工厂改建中国首个三线建设博物馆、攀枝花在建三线建设博物馆，用特殊方式展现了三线建设历史的方式，值得肯定。

第三,探讨和丰富研究方法。现在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多从经济、国防、党史和现代史学科角度进行研究,而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角度研究极少。学科背景不同,研究视角和方法各异。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看,在三线建设这个问题上,无论从哪个学科视角研究,都绕不开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至于操作层面上研究方法应该是具体的、多样的,研究者要紧紧与研究内容结合在一起,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及学科研究方法的长处,互相借鉴。要承袭中国优秀的学术传统,尊重研究者研究习惯和学术积累,科学对待西方学术方法。

第四，加强海内外的研究交流。海外的三线建设研究尽管不多，个别研究存在着立场的局限、观点的偏颇，但其研究考察视角、方法和一些观点还是富有启发性的，某些问题的论述深刻且有独到之处。大陆学者史料掌握比较丰富，对三线建设这段历史、政治文化背景的理解更接近实际。大陆学者既要积极介绍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要通过多重途径与海外同行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借鉴海外学者有益的成果，这对深化三线建设的研究必将大有裨益。当然这种交流是以不涉密为前提的。

责任编辑：刘莉

责任编辑：刘莉